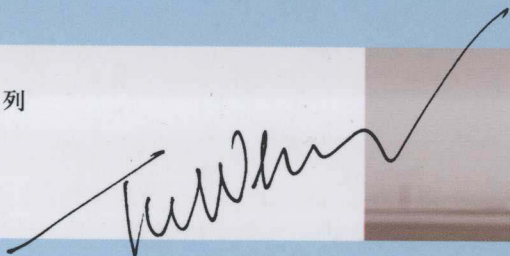


杜维明著作系列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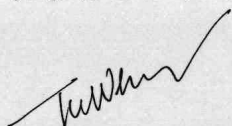
伯克利十年（1971—1981）

杜维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杜维明著作系列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

伯克利十年（1971—1981）

杜维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杜维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

(杜维明著作系列)

ISBN 978-7-301-21981-2

I. ①迈… II. ①杜… III. ①新儒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2242 号

书 名: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

著作责任者: 杜维明 著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981-2/B · 11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5.625 印张 插页 2 101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70 年代的杜维明在台湾淡水,背景是观音山



1971 年,在艾思本人文中心(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主持亚洲思想研讨会



1972 年,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和纽约犹太神学院院长对话后合影

献给挚友魏斐德(1937—2006,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作家、学者、行政领导、公共知识分子

再版序

1964年伯克利校园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FSM)是美国大学生政治自觉、非裔民权运动、全国反越战斗争最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件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和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八大名校的差异至少有三点。它是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的代表,加州阳光带经济力量兴起的标志,和“青年文化”的突出表现。如果哈佛还洗刷不掉牛津和剑桥传统的英国烙印,芝加哥还无法超脱德国大学的科研氛围,加大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风味。不少加大本科生是来自从未接受过任何大专教育的穷苦家庭,很多是社区学院的转学生,付不起基本学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包括一批靠政府资助的退伍军人。他们大半都是佛家说谓“自力”而非“他力”修行的成年人,阅历深,独立自主的意愿强。我从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出自书香名门或富商大贾的普林斯顿来到皆是普罗大众的伯克利

确有大解放大自在的愉悦。

北加州的海湾区天气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轻松愉快。和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凝重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说美国大陆向西倾斜，无根之人都滑倒在加州，伯克利的纽约客人数不少，好像都是异化感极强的东部人。面向太平洋的加州以高科技、好莱坞、葡萄酒、军工企业傲视美利坚共和国。放弃哈佛正教授职位移任伯克利社会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因对里根和尼克松政权的不满分析了东西两岸既得利益者的差别：东岸的贵族代表老传统责任伦理还起作用，加州的权贵受暴发户心理的作祟，唯利是图、为钱是问，充分显现贪婪的凡俗的个人主义。或者正因为西岸没有传统，不受习俗和宗教的约束，创业拼搏的气焰特盛，常常出花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学术界亦复如此。在伯克利从事教研就不能没有创意。按部就班的为学态度好象和伯克利的学风很不相称。

在学术界 20 世纪 60 年代是西化思潮转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大放异彩，现代性的标准不再是广义的西方而是美国现实的复制。伯克利大学生批判的对象即是美国“军工学复合体”所暴露的无知、傲慢和残酷。（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是“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因为大学教授的激烈反对才改为“军工复合体”）。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国外的穷兵黩

武显示了政治文化中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的白人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欺外的情绪已刺伤了开国元勋乃至林肯总统极力提倡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灵魂。伯克利大学生所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虽然源于校园，但它指向的目标是华盛顿，触及的面相是整个社会，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抗议也是文化自觉。在伯克利校园，我感受到一种清新、温润而情意绵绵的关怀荡漾在摇旗呐喊的声浪中。这也许就是抗议精神的热火和“嘻皮”（Hippi）的柔媚并存乃至融合的理由。不过，美丽的“鲜花男女”（Flower Children）在旧金山市的风景线上只存活了几个月便被毒品、色情、暴力种种黄黑恶势所污染了。毕竟，由美国精英的精英（“bright and the brightest”）为了“反共”而卷入的越南战争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可耻的、彻底罪恶的国家行为。在腐化的后期资本社会中，文化的矛盾已升级到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突的阶段。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可以说是1968年的全国学潮，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的街头动乱，乃至美国政治的“保守”转向的先兆。

我的伯克利经验使得我格外珍惜在普林斯顿任教4年的美好记忆。我和普大的师生相处极为融洽。牟复礼（F. W. Mote）和刘子健是我的忘年交。方闻、高友工、陈大端和梅祖麟是我的学长，Marius Jensen，Marion Levy，Walter Kaufman 和 Stuart Hampshire

是跨学科的谈友。特别难忘的是和李欧梵、梅广及劳思光在不同时段相处对话的愉悦。学校为我提供的宿舍是在丛林中面对卡内基湖的两层套房。一层是厨房、饭厅和配有落地窗及阳台的大客厅，楼上有三间宽敞的卧房。在那里，我曾招待过很多亲友访客，包括京都学派的祭酒西谷启治和禅宗大师佐佐木承周。还记得平常我从宿舍顺着野花遍地的小径信步到办公室只需十来分钟，可是和西谷及佐佐木漫行数次后总要滞留多达半个小时之久。经过他们的点拨，除非有急事，我从家里漫步上班的时间拖长了不少，而且每次都会发现一些从未照面过的奇花异草昆虫动物。值得一提的是佐佐木禅师在普大收了几个徒弟，都是我中国哲学“习明纳”（seminar）的同学。其中一位 Hal Roth 后来成为他可以承接衣钵的高徒。但不必讳言，当时我无法想象自己终其身在此普大和本科生细读文本精研章句做个名符其实的汉学家。我的求知欲太过强烈无法适应普林斯顿闲闲而来的雅趣，因此每周都会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听课（比如 Benjamin Nelson 的韦伯研讨会）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由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主持的宋明儒学讲座。我决定到伯克利历史系任教也是为了接受更大更多的思想挑战。

在伯克利期间（1971—1980），获得了美国学术联合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的长期资助，我主持

了一系列“儒学习明纳”(Confucian Seminar)。这个区域性的学术月会周五举行,报告 45 分钟,评讲 15 分钟,讨论至少一个小时。酒会用餐后,部分教授及研究生即步行 10 分钟到 1729 Spruce Street 的杜宅进行思想沙龙。次日周六早晨 9 时开始在教授俱乐部“会读”报告者预先提供的经典文本直到午后一点方散席。经常与会的同道包括倪德卫(David Nivison), Lee Yearly, 墨子刻(Thomas Metzger), 余佐翰(John Ewell)和 David Keightley。还记得有一次席文(Nathan Sivin)从宾夕法尼亚州前来作报告,“会读”期间,因文本解读的分歧,和墨子刻发生口角,后来两人又通过群发电邮争论不休,从学术交锋变质为人身攻击,我决定制止。1977 年,ACLS 邀请我组织为纪念戴震逝世 200 周年而举行的国际会议。陈荣捷、徐复观、冈田武彦、余英时,倪德卫、狄百瑞都提交了论文。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我担任了全校通选的中国哲学课,主持了调研哲学学科在伯克利如何发展的委员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认识分析哲学在英美学界的地位、角色乃至功过。我和桑特巴巴拉校区的 Fingarette 和 Raimon Panikkar 协商后,一度想转入该校的宗教系集中培养突出精神性的儒家学者。伯克利的文艺复兴教授 William Bousma 和师友之间的宗教社会学大家罗伯特·贝拉约我共同为伯克利本科生建立一个宗教专业。这不仅对加州大学系统的博雅教育有象征意义,对美国坚持政教分离的教

育政策也有参考的价值。我认为能够促使儒家身心性命之学进入美国大学教育的助缘，宗教学的影响远远超出哲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只从朴质的唯物论和平实的理性主义来宣扬儒家的先进性是不够的。我相信马克思或杜威对诠释儒家哲学都能提供很好的参照。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保罗的爱、马丁·路德的信、佛的慈悲，乃至马丁·布伯的对话却是更相应的精神资源。

在伯克利我开设了集中细读朱熹、王阳明和刘宗周《人谱》的研讨课。《青年王阳明》完稿后，我决定进一步探讨阳明的“致良知”和“大学问”。我特别想了解阳明的事功和讲学的关系。但把阳明的哲学文本细细体味后，我觉察到如果不能掌握朱熹的问题意识，即无法精切地理解阳明的晚年定论。于是我设置了广泛阅读朱熹原始文献和诠释论著的日课。详读《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后，我即开始撰写全面介绍朱子思想的书稿。1981年移教哈佛，我写定的两章在旧电脑中无法取出。虽然花费了上千美元所获只是乱码。当时很沮丧，但经过深层反思后感到长篇大论写朱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如果勉强而为之，不仅不能成说，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并无深远的价值，反而会增长傲心。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种“攻坚”的学术工程了。其实，我放弃写大部头的专著不是因为力不从心，也未必是开会太多，演讲的频率太高，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自己以为符合儒家

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

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作者列文森的学生魏斐德(Fred Wakeman, Jr.)和同事向纳(Irv Scheiner)的会话经验给自己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确是终身难忘。我们三人几乎每周都有饭局,多半是工作午餐。其实因为三间办公室比邻,又共同培养好几位研究生,一周三五次见面是常事,但真正难忘的还是定期的未尝或缺的月会。惯例是五点下班准时在教授俱乐部酒吧见面,(有成员每迟到五分钟便罚酒一杯),烈酒数巡后方到附近一家预定好的餐馆进食,至少又会共享一两瓶红葡萄。十时许移席到家(轮流)夜饮直到子夜一两点方散。大家都是而立之年,能吃能喝,总是谈得兴高采烈。但必须说明,我们聚谈的内容不外学术动向、教研心得和东亚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前景,从来不涉及私事,更不会闲言闲语。记得一次聚会正是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公布不久,主题便集中如何利用中美学术交流的契机发展伯克利和大陆学者合作研究的计划。

魏斐德是美国学术界的奇才。他当选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曾出任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的总裁。后来担任国务卿的赖斯曾是他麾下的特别助理。中美建交后他是美国科学院的第一位驻华代表。很多双边互惠的交流、访问和研究计划都是由他起草、定案、付诸实施的。1984年我和他

一起参加了由汤一介发起、景海峰承办，在深圳大学举行的高等院校中国文化研究的协调会。他和我们一样投入，不知不觉地即成为自家人了。他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的现况知之甚稔，对其发展前景有深切关怀，并且积极献身其中，忍受各种艰难而从不退却。他有领导才，有使命感，有远见。秉承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志趣而广结善缘，气派大而用心细腻，办事效率极高。他对伯克利的东亚研究，美国的中国研究，和“文化中国”广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作出了贡献。他自己在中国研究领域里有突出的贡献。从他的科研成果可以得知他是以赛亚·伯林学者二分中典型的“狐狸”。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在古巴及巴黎等地成长，父亲是小说家，海明威是父执，在巴黎上中学，哈佛毕业后进伯克利从游列文森之前（1957—1963）获得了法国高研院和英国剑桥专攻欧洲史的硕士，而且有一段据他说类似 007 的阅历。

魏斐德是一位地道的文士（*litteratus*），随时随地都准备笔疾书，动则万言，不管是专论、散文、公牍、报告、评审或是同事同学的介绍信，他都胜任愉快。他的出版物中有解析满洲建国大业的巨作，以王阳明的心学为背景的讨论理智与意志关系的哲学反思，三大册细说上海（1927—1937，1937—1942，1942—1952）的历史重构，和最翔实的戴笠传记。他有说故事的天分。他获得稿酬最多的是本科生时代在哈佛写的用匿名发表的两本鲜为同事和同学所

知的侦探小说。但他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正好相反,他身体健壮,孔武有力,精通猴拳之类的武术,而且是可以参赛的帆船高手。我在哈佛、普林斯顿和伯克利接触到不少很有才华的人物,但 Fred 这位挚友的“光芒”(brilliance)确是独一无二。他热情洋溢,能爱能恨,敢于承担,可以义无反顾地全身投入。他有浪漫的情种,豁出去不计后果的豪情。他晚年不幸手术失误下肢瘫痪又备受病情的折磨,如果不是妻子梁禾的悉心调护,真是不堪设想。但直到临终,他热爱生命和拥抱友情的达观没有丝毫减杀。

在伯克利任教期间,我有缘和欧美思想家,像 Raimon Panikkar, Herbert Fingarette, Burt Dreyfus, Paul Ricour, Benjamin Nelson 和倪德卫论学。同时,我每个暑假都到艾思本人文中心和资深外交家 Phil Talbot 主持“亚洲思想研讨会”。参加的学员多半是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如电视评论员 Bill Moyer, 文学家 Sol Barrow, 生物学家 Gell-Mann, 音乐家 Robert Mann,《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 Seymour Topping, 可口可乐的资深副总裁 Cliff Shillinglow, 外交家 Winston Lord, 议员 J. Jarvis 及其夫人 Marion Jarvis。和他们早上一起“会读”四书,讨论孟子的性善说, 辩解《道德经》的逻辑思维,破译禅宗的公案,下午一起游山玩水, 欣赏古典音乐,或乘皮筏冲刺科罗拉多河湍流。在艾思本的经验(和数十位政治、媒体、企业、文艺和学术界的领导进行长期平等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

互惠的交往)扩大了我对美国公共领域的理解,深化了我对儒家现实性和公共性的体认,也加深了我展现儒家人文精神的信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我在艾思本人文中心主持“全球社群中的华人”(“The Chines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七八次,我乘机邀请了好几位“文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赵复三、李慎之、王赓武、金耀基、资中筠、刘海平、倪世雄和李明俊),为他们提供机会认识美国精英如何培养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这本书所收的15篇散文和9篇评论,原来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刊行时的题目是《人文心灵的振荡》。表面上,都是即兴之作,急就章,但时隔几达40年我自己细读每一篇后对当时撰写的心情还历历在目。其实我当时为这些观点、人物、事件和情境所触动,因为对我而言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真观点、真人物、真事件、真情境,没有一点虚假。“体验”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经验因为那是“体之于身”的实感,一旦进入生命之中则永不退色,并且不只是平面的图象而是立体的,与日俱新的,富有转化功能的动态活动。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础来“做哲学”便不能把哲学当作职业,当作维持生计的工具,也不能把哲学对象化视为与自己生活世界了无关涉的研究课题。当哲学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之后,你便不愿意也不可能自外于哲学的家园。即使到印度等地旅行也无

法离开儒家哲学的家园了。所视、所听、所闻、所尝、所触、所感、所应、所动皆是哲学之道。王阳明认为“良知”无所不在,连草木瓦石皆有良知,而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随时随地都可体现良知。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实在在扎根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人学,一种每个人都能自知自证的生命哲学。这种对人的了解虽然不是生物学、生理学或心理学分析的结果,但我近来一再发现这种心灵哲学和演化论、认知科学及脑神经的新趋向颇有吻合之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寻求人生的意义是一种“根源性的抉择”,一种牟宗三所谓“逆觉体证”的精神磨练。我很幸运从事哲学工作的“问题意识”在出道不久即已形成了。但我已逾古稀之年而真正的哲学反思好像才刚刚开始。孟子所谓“然而无有乎耳,则亦无有乎耳”可以引为浩叹!

2013年2月9日(除夕)

耕心敦(Kensington)灵修院800号